

南京党史資料

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資料征集編研委員會辦公室
南 京 市 檔 案 館

23



南 京 党 史 资 料

中共南京市委党史资料征集编研委员会办公室

南 京 市 档 案 馆

23

一九八八年十二月

封面题字： 武 中 奇
责任编辑： 成 东 红

南 京 党 史 资 料
(23)

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办公室
南 京 市 档 案 馆

南京金城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1/32 印张4 字数77千字
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
印数1—4,500册

报刊准印号：(JS)字第3185号

定价：0.90元

剧专师生参加抗暴游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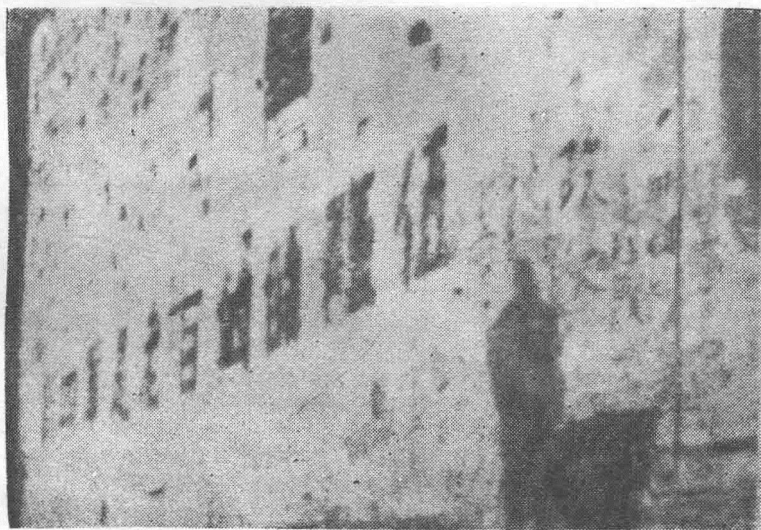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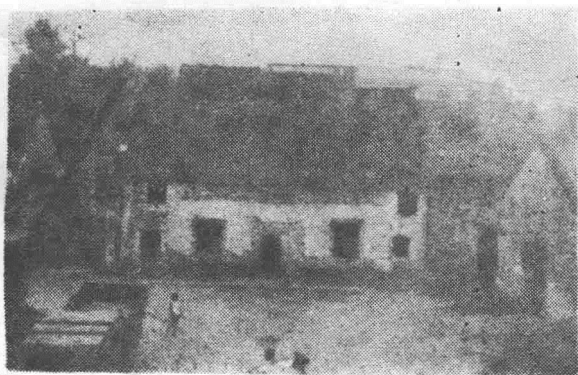
在『五·二〇』运动中，中大、
剧专同学游行到美国大使馆前



剧专同学参加『五·二〇』游行



新四军一支队司令部驻地
——淳溪镇吴家祠堂



新四军在淳溪镇小桥头书写的墙头标语，内容为
“新四军是老百姓的队伍”

目 录

回 忆 录

- 我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——南京（上）……………陈修良（1）
- 1946—1947年国共谈判破裂目睹记……………叶笃义（14）
- 一支活跃在第二战场上的轻骑兵
- 记解放战争时期剧专的学生运动…陆九如 赵琪（32）
- 我与剧专支部……………饶展湘（52）
- 靠真理 靠党 靠群众
- 剧专 支部活动追忆……………邵 单（59）
- 解放战争时期党在自忠中学的活动……………陈修良（76）
- 自忠中学据点纪实……………赵庆辉（78）

专 题 综 述

- 南京地区较早的农村党支部
- 九袱洲支部……………黎唯志（87）
- 高淳地区抗日民主政权的财经工作……………（92）

小 故 事

- 滁河枪声.....李宝珠(104)
 智取密电码.....于 彤(111)

文 献 资 料

- 金钊南关于南京市最近工作报告(1928年2月20日)
(116)
 蓝国栋致省委的报告(1928年3月9日).....(122)

附 录

我们战斗在敌人的心脏——南京(上)

陈修良

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，南京的党组织屡遭破坏，但是每次破坏以后又重新建立起来，无数革命烈士前仆后继，英勇牺牲在雨花台下。敌人的镇压并不能使人民不革命，从血的教训中，我们共产党人也逐步学会了怎样和残暴的敌人作斗争。自抗日战争时期以后，特别是在三年自卫战争时期南京地下党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，这个经验是值得总结的。也就是说，在这个时期我们党接受了过去的教训，运用新的斗争策略，所以能够在白色恐怖严重的敌人心脏中坚持到南京解放。

1945年8月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，我从华中建设大学调到华中分局城市工作部担任南京工作部部长。1946年4月，我脱下军装进入了敌人的心脏——南京，一直担任市委书记职务，直到南京解放。回顾这一段历史，有许多地下斗争的经验值得总结。随着时间的流逝，虽然对一些具体事情的记忆已逐渐淡忘，但基本的历史轮廓还是记得清楚的，因为这些都是亲自经

历和耳闻目睹的事实。

从南京工作部到南京市委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，当时我正在华中建设大学任财经系副主任。不久校长彭康同志通知我：“党中央将在延安召开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，你与李仲融教授被选为出席大会的代表”。接着华中局组织部部长曾山同志又找我谈话，问我有什么困难，我说“没有”，就欣然上路。一个出席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华中代表团立即组成，团长是黄逸峰。我们这个代表团从淮安出发，一路上还同敌伪军发生过几次小的战斗。过了古黄河，正向山东进发，9月间，华中局忽来电报，说国内形势发生了变化，国共双方准备在重庆举行会谈，共商建立联合政府，延安的代表会议不开了，我们就迅速返回淮安。这时华中局已北移山东，改组为华东局，华中地区建立了华中分局，属华东局领导。

我回到淮安后，华中分局副书记谭震林等负责同志找我去谈话，决定派我去城工部工作，任命我为城工部的派出机关——南京工作部（全称是“中共中央华中分局城工部南京工作部”）部长，南京工作部驻地在六合县。分局给我的任务是：统一领导南京城内各个系统党组织及其工作。南京城内的党组织原来有华中局城工部领导的南京工委，苏南、淮南、皖江等区党委领导的党的组织和党员，这几条线彼此不发生关系，现在统一由南京工作部领导。

我们的机关大约有20多人（流动的不算），设秘书科（科长王昭铨）、组织科（科长朱子英）、宣传科（科长王荣元），其余的是会计、管理员、警卫人员、交通员以及学习班的成员等。为了靠近南京，便于领导，机关开始设在六合县竹镇东面，六合县解放后一度迁入六合县城内办公。1946年初，因为国民党军队要进占六合县城，我们又撤退到天长城内，机关设在苏家花园内。

南京工作部与南京的党组织来往频繁，我记得我们在六合县城时，方休、刘峰、朱启奎、柯秀珍、彭原、董铭等都来汇报过工作。新四军二师、七师派到南京的干部也来汇报过工作。我们和他们谈话，主要是了解南京党的工作情况，谈时局与政策，要求他们要充分利用合法条件，向广大群众宣传反对内战，反对专制独裁。同时，我们建立了交通联络站，指定可靠同志担任政治交通工作，传达党的指示或秘密文件或陪送来往的干部等。

1946年的春节，我们是在苏家花园度过的。一天晚间，部队送来一个紧急通知，说敌人已离开天长不远，要迅速转移。我们立即收拾文件与随身用品，连饭也来不及吃，就匆匆向北转移。走了数十里路，我们住入一户农民家里，才造饭充饥。这时分局城工部来通知，要我们立即撤退到淮安。到了分局以后，分局认为内战已不可避免，国民党将撕毁“双十协定”，准备进攻我华中地区。南京工作部已不可能隔江领导南京的工作，因此决定撤销，成立南京市委，派我前去南京任市委书记，刘峰为副书记，委员有朱启奎、方休、王明远。

我在城工部住了几天，分局负责人找我谈话，认为南京工

作十分重要，南京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，从政治上讲比上海更重要。南京市委仍属分局城工部领导，不能与南京梅园新村的中共代表团直接联系，彼此之间如互通情报，只能通过华中分局。

在南京工作部撤销之前，我们已派了一批干部进南京，其中有卢伯明、刘真、王荣元、王明远、陈良、洪路、高骏等。我是4月中旬最后离开城工部去南京的。沙文汉同志在我临行之前作了一首诗赠我，诗云：“男儿一世事横行，巾幗岂无翻海鲸，欲得虎子须入穴，虎穴而今是南京”。

南京城内的确非比寻常，特务如毛，确有“虎穴”之感。但这并不能使我胆怯，我心中所想的只是如何去完成党给我的任务，管它是什么“虎穴”和“龙潭”。就这样我脱去军装，换上旧时装，渡江到了镇江，然后又坐火车进入南京，同行者有朱启銓、马文林同志。

到南京后，我暂时住在朱启銓同志的家里。后来考虑还是要单独居住，以免牵连，就在城内找了两间房子，我和会计金展辉各住一间。后来考虑到国民党要查户口，我们来历不明，恐怕出事，就决定搬家。不久我就住入柏焱、柯秀珍夫妇的家里，柏焱在一个化工厂当技师，柯秀珍是中学教员，我就算是他们的“姑妈”。他们家在中正路武学园3号的楼上，我住在右面的厢房，市委同志也常在这里开会。

统一领导 加强团结

到了南京以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召开第一次市委会议。时间

是在4月下旬，地点在磨盘街42号张杰(鲁平)的家里。张杰的父亲是一个同情革命的进步人士，他一家独住，我们在他家后院开会，十分安全。我传达了华中分局城工部的指示，要求南京市委发动与组织广大群众，拥护党的和平民主的政治方针，反对内战与独裁；在群众运动中建立党的组织，发展党的组织；为了防备在时局变化时国民党可能采取残酷镇压，市委组织必须严密，不设机关，干部要职业化、社会化，立足于群众之中。

经过讨论，我们决定市委不建立各部的机构，而由委员分工联系各系统的工作。当时在学生方面已经建立了学生工作委员会，书记由王明远兼任，委员有欧阳仪、盛天任；在工人方面还没有成立“工委”，只是由陈慎言、彭原、高骏等同志分头联系工人方面的工作。同时市委还建立了情报系统，它同市委各级组织不发生关系，由卢伯明负责，由我单独联系。情报全送上海中共办事处或华中分局，一般都是送到上海中共办事处刘少文同志处。方休同志仍然领导他原有关系，记得有中央商场、棉纺厂、小学教师、公务员等支部。本来想建立城南和城北两个区委，后来觉得区委一成立，许多横的关系又增加了，不如仍按各系统分头领导，只要市委负责人不出问题，我们的组织安全是有保障的。当时的指导思想是统一领导，加强团结，反对任何宗派主义。由于南京党的头绪较多，如果不能高度统一与分工合作，我们就难以坚持下去。大家都同意这个意见，提倡有话当面谈，实行党内民主集中制，这个党的基本原则在南京党内行之有效。

当时南京的全部党员约有220人，其中原南京工委的约有140名党员，苏南区党委系统有40多名党员，淮南区党委等系统约有30名党员。在100万人口的南京人民中，我们党员的比例很小，但无论如何这是党的基本力量，在日伪统治的艰苦条件下，能够坚持下来是很不容易的。这些党员的分布如下：工人方面，浦镇工厂、下关车站、浦口车站、中央商场、印刷厂、401汽车修理厂、首都电厂、三轮车工人、电讯局等有支部、小组或少数党员关系。学生方面，临时大学有一个支部约10多人，钟英中学有一个支部，其余多是个别党员。大专院校的教职员尚无党员，国民党军政机关只有个别党员，至于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还有待于我们去展开。

1946年7月以后，内战形势日益明朗，国民党军队向我解放区进攻，南京的工作日益艰苦。个别党员思想发生动摇，要求退党或自动脱党，擅自离开南京到别的地方去。根据形势变化，市委决定在党内进行气节教育、理想教育，指出中国革命的前程远大，国民党日益腐败，力量的对比正在起变化。这种教育收获很大，使大家认清形势，振作精神，不怕困难，努力工作，并为万一被捕作好牺牲的准备。

南京是国民党的首都所在地，在这里搞情报工作特别重要，我们看谁适合作这方面的工作，就调他到情报系统来。最难开展群众工作的单位，如某些军事机关，往往是情报工作的重点单位。情报工作是一条看不见的战线，它对战争的胜利有时是起决定的作用，人民解放军在前方打仗，非常需要南京方面的军事情报、政治动态，所以我们特别重视这项工作。情报

系统专职人数极少，只有卢伯明、刘贞、王荣元、白沙等，我们的工作主要依靠群众的力量，不采取收买、引诱等手段。

1946年6月间，在我们党的领导下，上海各界人民代表马叙伦等到南京请愿，要求和平、在下关车站遭到特务的围攻殴打。事件发生后，南京人民纷纷去医院慰问受伤代表。根据当时广大群众希望和平、反对内战的思想状况，我们提出地下党的工作要扎扎实实地做发动群众的工作，领导职工为争取生存而斗争。

内战开始后，大江南北往来困难，敌人盘查甚严，交通几乎中断，为了及时得到上级党的指示，我们千方百计想与上级取得联系。我知道刘晓同志在上海，就通过一些关系，希望见到他。不久，刘晓同志来找我了，他通过我的母亲陈馥约我见面（我的家本来是江苏省委机关，我的母亲是掩护这个机关的，同刘晓同志很熟悉），就在我的家里同他相见。他告诉我说：内战是长期的，要准备5年至15年坚持在国民党区域的工作。他还问我有决心吗？我回答他：“有决心”。他高兴地对我说：因为长江的交通断了，今后南京市委的工作改由上海党领导。

1946年底，在南京的中共代表团因被国民党监视，已经不能进行正常工作了。负责党的组织工作的钱瑛同志由南京转到上海作地下工作。1947年1月成立上海分局，领导成员有：刘晓（书记），刘长胜（副书记）、钱瑛、刘少文等4人。

内战开始后，华中分局城工部在上海建立了办事机关，开始仍保持独立工作，不久由刘晓同志建议，经中央同意，把华

中分局城工部合并到上海分局。1947年5月6日，中共中央决定将上海分局改为“上海局”，沙文汉任上海局的宣传部长，分工领导南京市委工作。

南京是要查户口的，我住在柏焱、柯秀珍同志家里，得到他们的精心掩护，市委负责同志经常到我住的地方开会或接头。1947年1月方休同志调离南京，陈慎言参加了市委。市委开会极少，往往只有三个人在一起碰头，研究工作，人再多就有危险了。我出门找人，经常走小巷子，转弯抹角地绕圈子，下雨天带伞，夏天带墨镜，从不进电影院、商场、旅馆、茶楼、酒肆、公园、游乐场所，隐姓埋名地在敌人的心脏进行地下活动。

开辟第二条战线

1946年12月间，北大女学生沈崇被美国士兵奸污，引起北平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怒。1947年元旦，北平学生罢课游行，抗议美军暴行，全国各大城市的学校纷纷响应，举行示威游行，南京的金陵大学、中央大学等大专院校于1月2日、3日也两次举行了抗暴游行。抗暴运动以后，上海分局曾叫我去上海开会，这次会议由刘晓同志主持，刘长胜、沙文汉同志也参加了。上海分局认为抗暴运动的发生是合乎情理的，反映了人民对美蒋进行内战的仇恨，矛头直指国民党政府的反共政策。现在上层民主人士的思想也有转变，爱国统一战线正在不断扩大。由于我们发动了抗暴运动，国民党一定要镇压，因此，我们的策略要更灵活，要站在群众的前面，同反动派作殊死的斗争。

我们的口号是：反对国民党进行内战，要求生存的权利。上海分局还认为，要从生活斗争开始，结合政治斗争，积大小的斗争汇成一股反帝反封建的统一运动，估计红五月将是一个高潮。上海分局的意见报经中央同意，中央要求我们坚决放手发动群众，进行反美反蒋的斗争，把人民爱国民主运动大大地推向前进。南京市委坚决执行这一方针，具体研究了斗争的策略，要求尽量利用各种合法的机会，发动群众，要求改善生活，求得生存的权利。

从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2月，我解放军已歼敌71万人，敌人由全面进攻被迫改为重点进攻。他们滥发纸币，造成通货膨胀，物价飞涨，民不聊生。在此期间，国民党还不顾一切召开了伪国民大会，立了什么“宪法”，结果是使人民更加看清了他们搞一党专政、实行独裁政治的真面目。新华社发表了“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”社论，对蒋管区人民鼓舞很大。我们通过收听延安电台的广播，知道国民党军队在前线大败，人心更加浮动，便利用这个机会，发动群众要求增加工资，发动学生争取民主权利和言论、结社的自由。

1947年2月初，中央大学学生改选学生自治会，进步力量获胜。这时中大的进步势力已经相当强大。原来在重庆由党秘密领导的“新民主主义青年社”的成员也随中大回到了南京。

“新青社”在中大很活跃，同我们原来的进步力量结合在一起，我们的声势更大了。南京当时有11所大专院校，“中大”、“金大”是两个重要的支点，许多运动往往在这里带头开展起来。一些重要的中学中也有我们党的组织。从主观力量看，那

时我们在学校中的革命力量还是比较强的。“中大”与“金大”教职员中也有个别党员，我们通过这些党员去开展统一战线工作。如中大的梁希、潘菽教授等都同我们有了联系。1947年5月6日中央大学教授会发出了“要求提高教育经费，改善教员待遇宣言”，措词相当尖锐，对全国文化教育界的影响很大。

5月13日，中央大学学生在市委学委的领导下，发表请愿宣言，要求增加副食费，明确提出争取生存的权利。他们提出：按2月份伙食标准开伙，吃光后绝食，举行饥饿大游行。这个宣言发出后，学生即实行罢课。5月20日由南京首先发动，联合沪、苏、杭共有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举行了“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”。学生在游行的过程中遭到国民党军警的镇压，有许多人受伤和被捕，这就是震惊全国的“五·二〇”血案。

“五·二〇”运动的政治影响极大，广大群众非常同情学生的革命行动。毛泽东同志1948年5月30日在《蒋介石政府已处在全民的包围中》一文，对“五·二〇”学生运动作了很高的评价，他说：“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。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，这是第一条战线。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，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。”因为这个运动发生在国民党的首都，意义特别重大，我们在蒋介石统治的心脏地区放了一把火，客观上同解放军起了配合作用。国民党更加失去了民心，连反动营垒中的人也发生了动摇，大大便利我们发动广大群众，进行情报、策